

劝募与勒索

【1912影事】

在革命军政府的强制募款面前,反而是租界在保护治下民众免于恐惧的权利,这也是民初的一大讽刺。

韩福东 资深媒体人

保皇党张勋的塑像竖立在上海张园的大门口,如果捐款1元,可以打他一耳光,捐款100元,则有资格一拳将其放倒。张园内,连续三天文娱演出,每天都有千人左右花一元钱购门票观看。有一个叫梁心竹的歌女,还准备以自己作奖品,嫁给抽中彩票的男子——彩票5元一张。这些钱将用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经费。

1912年的元旦,共和降临。革命党营造着改天换地的新氛围,而上海城内,却有不少家产殷实者正陆续迁居公共租界。他们怕极了募款。

养着大批兵员,民国临时政府需要钱财充当军费。有些所谓的义演,因民众不买账,甚至是亏钱的。1912年1月24日在上海福州路丹桂舞台的一场演出,只收入276元,而支出就达450元。所以,他们还需要向商户伸手要钱。革命党常常下发一个通告,就把各客栈一天的营收全部认“捐”了。

对富人而言,避走租界是一种选择,抗议是另外一种选择。1月5日下午,上海丝经同业公所在知名实业家杨信之的主持下,60名湖州商人聚集一堂,表达对强迫捐款的不满。几天前,110名商人被宝山军政府邀请到温州会馆,在大门紧锁且由武装士兵看守的情况下,革命军首领李徵五令手下以手枪相威胁,要求与会者捐款51万元,从下午1点一直到晚上11点,失去自由的商人们连饭都没能赶上,只好签署了保证偿付捐款的期票。

杨信之此前曾资助同盟会革命经费,包括陈其美赴日留学,他也助力甚多。此次受此胁迫,当然心有不甘。在1月5日的会议上,他们决定致函已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质问如此侮辱知名绅商的行为,是其下令否?出于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他们要求陈其美废除枪口下签署的期票,且撤走驻扎在湖州会馆的驻军。不过,这些商人又保证,四天后他们将自愿筹款,数额将不少于51万元。

4天后的募款现场出现了陈其美的身影。经过讨价还价,捐款数额降至40万。陈其美给出了“建议”指标:拥有1万元家产的捐100元,100万元者捐4万元,200万元者捐10万元。能表达一下抗议的,都是相当有实力且多少和

革命党有些交情的商人。至于中小商户,多半根本没有谈判的本钱,即便避走到租界内,也摆脱不掉勒索与敲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葛雷在杨信之等人开会抗议当天,曾给比利时总领事兼领袖领事西弗尔特去函汇报“革命党今正在上海县,特别在租界内进行募捐”的情况。他说:“劝募与勒索之界限几乎难以分清……殷实华人收到募款通知后,就有自称革命党代表的人再三来访,不胜其烦……”

在这封信中,葛雷说,为革命党经费募集志愿捐款,外国当局本无异议,在以往的两个半月内,也采取了“合适的中立态度”,但工部局亦有责任“尽力保护租界全体市民免遭暴力胁迫,而向革命运动做出违反本人意念之捐助”。此信之后,西方领事团向民国临时政府发了抗议信,而上海外事代表温宗尧则回函表示,“那些目无法纪的行为,其动机我们绝不同意。兹谨奉告我们对制止再次发生类似情形之迫切心情与外国友人是一致的……为禁止租界内的非法活动,愿与工部局全力合作”。

在革命军政府的强制募款面前,反而是租界在保护治下民众免于恐惧的权利,这也是民初的一大讽刺。

强制募款,已经令人头大。更严重的是,这笔钱到底用到了哪里,没几个人能说得清楚。坊间有传言,陈其美掌控的沪军都督府,账目金额亏空,且说不清亏空原因。这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待到1912年5月底,在上海京江公所举办的千人会议上,很多人发言指称革命募集的大批捐款,已经被陈其美、李平书(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局长)贪污,人们经常看到他们出入妓院嫖娼,导致募款账目无法公开。

无论这些募捐来的款项有多少用作了军费,总之它是不敷支出的。革命党还需要其他办法筹措资金,包括绑架。那值得另起篇章讲述。



要电视机,还是要战斗机

【摄影眼】

印度官员的座驾,可以几十年都是一款国产车型,但武器采购更新的速度却越来越快。

毛小雨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看,从2007年至2011年间,印度军火采购量已占到世界的10%,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准之低,在不少指标上也是排在世界前列的。

从不久前印度内政部的总注册师办公室发布的2011年第一阶段统计数据看,该国六分之一人口没有收音机、电视机、交通工具和电脑,这种差距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非常大。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有电视机,城市中有75%的家庭有电视机。电视覆盖率在首都新德里达到88%,最低的比哈尔邦只能达到15%。

2011年,印度内政部首次把电话的统计数字分成移动和固话两类。整个印度有电话机的家庭达到63%,拥有一部手机的有53%,既有

固话又有手机的家庭只有6%。同时,大约20%的城市家庭和5%的农村家庭拥有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此外,半数印度家庭没有交通工具,只有5%的家庭拥有小汽车,21%的家庭拥有摩托车,45%的家庭拥有自行车。

这组数字不仅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距甚远,就是与作为金砖国家的其他国家相比,也非只有半步之遥。为什么印度在军购上可以豪掷数百亿美元,而对民生的基本需求鲜有解决之道呢?

这与印度的国防政策有密切关系。长时间以来,作为南亚次大陆体量最大的国家,其他国家在经济总量、工业基础、人口规模、教育水平等综合实力方面,与印度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印度环顾周边,享有绝对的话语权,常常通过武力得到想要的东西,譬如说肢解巴基斯坦,使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吞并锡金,使其成为自己的一个邦。此外,当斯里兰卡处于内战时期,印度大举出兵进行干涉,还派伞兵去印度洋上的小岛国马尔代夫平定叛乱。

虽然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准还处于相当低下的程度,但依然挡不住印度增加军费的计划。预算案显示,2012至2013财年预算,印度

军费开支将比上一财年增加17%,将提升至1.93万亿印度卢比(近430亿美元)。对高端武器的崇拜,已经成为印度上下痴迷的事。印度官员的座驾,可以几十年都是一款国产车型,但武器采购更新的速度却越来越快。

耐人寻味的是,老百姓可以为物价上涨示威,可以为官员腐败示威,可以为种姓歧视示威,但鲜有听说因为大幅提高军费,以致民生问题多多而示威的。这与印度人认为先进武器可壮国威的民族自豪感有关,也与印度人的生活哲学有关。不爱攀比,性情疏懒,有没有电视机、手机、小汽车,并不是衡量其是否幸福的唯一指标。穷而快乐着,是很多印度人的生存之道。



新京报漫画 许英剑

谁是图卢兹枪案中最大赢家

【人在欧洲】

图卢兹枪杀事件却让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在没有安全感的国度,谈任何其他的话题都显得苍白无力。

胡艺瀚 旅法学者

3月21日,法国经历了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实施图卢兹三起枪杀案件的枪手梅拉,在其住所与法国黑豹精英特警队对峙32小时之久,随后在警方展开的突击中被击毙。至此,玫瑰城图卢兹居民数日来的噩梦终于结束。

这一切完全打断了总统竞选的进程。随着事态的发展,法国各总统候选人调整自己的言行和立场:萨科齐第一个宣布暂停竞选宣传活动,重新披上总统的外套,亲自坐镇指挥,回归到最擅长的治理安全的阵地;社会党竞选对手奥朗德则态度谨

慎,采取“双总统”的对策,行程和礼节仪式上皆参照萨科齐,在枪手身份最终确定之前不发表任何评论;极右翼的玛琳·勒庞则见风使舵,在犹太学校师生被枪杀后首先态度低调,而在伊斯兰圣战组织在事件背后的鬼影弥留初现之际,她声称要和极端伊斯兰教“决战到底”。

事过一周,图卢兹枪杀事件渐渐平息,案情的发展已经逐渐深入到对梅拉其他家庭成员的调查,对事件背后恐怖组织的清算,以及法国现有反恐法令是否完善的讨论中。然而,它所产生的长期效应,才刚刚全面显现。事实上,这个事件已经逐渐成为摆脱不掉的阴影,若即若离地笼罩着本届法国总统大选中其他所有的议题。这个媒体效应强大的案件经过发酵,产生了强大的悲剧效应,让所有关于“谁是图卢兹枪案中最大赢家”的计算失效。

根据最新一轮的民意调查,萨科齐的民意支持率没有像部分观察家预言的那样飙升,而是维持着原有的节奏,拉近了与竞争对手奥朗德在两轮投票中的差距。然而,这并没有为萨科齐争取多少喘息的空间,因为第一轮投票在即,法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法国民众的购买力基本停滞不前,而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2%。在选民最关心的话题中,排名前三位的依然是购买力、就业和经济增长。这无疑是在给谋求连任的萨科齐带来极大压力。

抨击萨科齐五年的政绩,一向是奥朗德最乐道的话题之一,奥朗德不断提醒选民:法国的实际情况要比看起来糟糕得多。对图卢兹枪击案,奥朗德多次质疑警方“长达32小时对峙”的办案效率,还指出目前法国保安系统存在漏洞。当然,萨科齐也多次在地区竞选拉票会

上抨击奥朗德,嘲笑他没有对任何一条反恐的法案投过票。

那么,为什么即使梅拉公然出国接受过基地组织的训练,他依然没有受到反恐机构更有效的监控?为什么他在图卢兹连续三次袭击没被更早地制止?为什么他用来作案的工具和武器,没有更早地引起警方的怀疑?法国再次收到了恐怖主义组织公开的袭击威胁,这样的惨案还会在法国重演吗? 这些问题让人不寒而栗。

“后图卢兹”的总统大选进程,似乎又回归到它应有的正常轨道。但是,图卢兹枪杀事件却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在没有安全感的国度,谈任何其他的话题都显得苍白无力;也又一次让执政者见识到,恐怖袭击的方式已经愈见灵活,不计较成本和代价。在世界反恐舞台上,恐怖分子没有特征,而反恐斗争也没有国界。